

艾柯研究



艾柯与中国^{*}

李 静

摘要：艾柯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和小说家，对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研究艾柯和中国的关系：第一，艾柯的两次中国之行；第二，艾柯对中国的研究和兴趣；第三，艾柯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艾柯和中国有着亲密的关系，他对中国文学文化有积极活跃的影响和意义，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关键词：艾柯，中国，关系

Eco and China

Li Jing

Abstract: As a famous novelist and semiotic, Umberto Eco wins profound influence in academia as well as in literary circle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 and China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Eco's two visiting to China; second, Eco's research and interests concerning China; third,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y about Eco in China. In conclusion, Eco and China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he produces positive influenc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美学传统与艾柯的美学思想研究”（18BWW009）阶段性成果。

□ 符号与传媒（24）

Chinese culture, which makes him a very significant topic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y.

Keywords: Eco, China, relation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1008

导 论

作为博学大师，艾柯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在诠释学、符号学、美学、哲学和宗教等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可以说，艾柯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天才式学者作家，他凭借对整个博大精深的西方文化深入的了解，令世界瞩目，成就了他如今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广受推崇的地位。艾柯及其所属的西方文化和话语权不能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就像歌德、马克思曾经预言过的那样，“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今天，学术交流在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和对话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艾柯的两次中国之行充分说明了他对这个东方古国文明的好奇和向往，他在中国高校的讲学充分说明了他对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地位的肯定和对中国学术界寄予的厚望。

中国在近现代世界新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以后，西方的思想和文艺理论不断输入。这个输入过程尽管引起过种种争论，但从未中断。中国文论处在一个重构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既有与过去决裂的阵痛，也有对未来不知去向的迷茫，更有在西语众声喧哗中患上的“失语症”。但是我们坚信，在中国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坚持下，中国文论一定能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以一种平等的地位与西方对话。作为一代理论大师，艾柯的符号学诠释学理论已经给中国文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艾柯的美学理论以及其他理论也必将给中国学界以影响与启示。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艾柯创作的百科全书式博学小说将作者、文本、读者紧密联系，建构成巨大的知识迷宫和智慧殿堂，对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也有重大的启示。分析艾柯与中国的关系，能够扩展中西方文学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为中西方文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一定的贡献。

一、艾柯的两次中国之行

艾柯曾经两次来中国，参加会议，参加文化考察，发表自己对于中国和

世界的各种看法，他还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中国与中国文化。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文化交流，值得发掘和研究。

1993 年，艾柯第一次来中国，参加中国和欧洲共同举办的为期三周的“丝路文化联合考察计划”。考察队从广州出发，途径西安、敦煌、吐鲁番，最后到达北京长城。艾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独角兽与龙》的演说。在这个演说中，艾柯提出了自己对于非基督教文化的看法，并表达了对异形态文化（相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而言）的尊重。“艾柯认为，当两种文化相遇时，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乐黛云，1995，p. 1）这种冲撞表现在三个方面：征服、文化掠夺、交流。征服，就是指优势文化成员将劣势文化成员视为非正常人类，并将其定义为野蛮人或者低等人。对于这两类人，优势文化成员会采取教化或者毁灭的政策以达到同化或者消灭的效果。文化掠夺与征服听起来很类似，但是在实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别。文化掠夺即“A 文化成员认为 B 文化成员是某种未知智慧的传人。A 文化可能在政治、军事上征服 B 文化。但，他们又十分尊重这一异文化”（乐黛云，1995，p. 1）。比如，希腊人欣赏埃及人的智慧，并且吸收借鉴其智慧的成果。“交流，是一种相互影响和尊重双方的流程。比如欧洲在最开始接触中国时就属于这种情况。总而言之，征服、文化掠夺和交流是三种抽象的模式，事实上，在具体的个案中，这三种态度是融合出现的。”（乐黛云，1995，p. 2）

接下来，艾柯还谈到了“崇洋”的概念。与今日国人大谈特谈的崇洋媚外不同，艾柯认为，崇洋只是一种态度和方式的不同，没有上升到国家民族和政治的高度。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具有客观性和理性。艾柯举例，自 17 世纪直到 19 世纪早期，整个欧洲都痴迷“汉风”，欧洲艺术在某个时期几乎变成中国式的。在这种文化态度的驱使下，“一切来自于遥远异域文明的陌生、不同、非一般化的事物都显得美丽、诱人”（乐黛云，1995，p. 2）；同理，在另一个时期，欧洲文化又变成古希腊式的或者中世纪式的。艾柯这种颇为自我剖析式的看待自己浸润已久的西方文化的方式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态度尤其值得借鉴。

在《他们寻找独角兽》一文中，艾柯的中心还是有关误读的——错误认同（false identification）。他以寻找独角兽为例，证明了“背景书籍”的影响力和这种影响力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此他提出中国之行的宗旨：“不是寻找独角兽，而是努力理解龙的习性和语言。”（乐黛云，1995，p. 12）

2007 年 3 月，艾柯第二次到中国。与第一次丝路文化考察不同，这次他

□ 符号与传媒（24）

受到的关注堪比娱乐明星，从上海到北京，艾柯成了最耀眼的学术明星。由此可以看出艾柯在世界上尤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也可以看出传媒业的迅速发展。第二次他谈的主要话题不再是传统的文化图腾，比如上次谈独角兽和龙，而是更多聚焦于当下的世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治与乱”的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古典战争与后现代战争》的演讲。

综合来看，各家主流媒体的采访主要谈论的是艾柯的文学思想和艾柯关于世界变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新鲜事物的一些看法。《新世纪周刊》报道开篇便写道：“‘小径分岔的花园’是艾柯的魅力所在。每一次阅读体验，就像参加了一次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冒险游戏。”（张鹭，2007，p. 110）在这次采访中，艾柯主要提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对于书籍的看法是：阅读书籍能够引发思考。显然，这是对后现代思潮中关于“文学已死”和“书籍已死”看法的直接驳斥。（2）对历史的看法：被误读。艾柯认为：“历史上很多谎言被当真，结果就创造了历史。”显然，艾柯对历史的看法与对文学的看法如出一辙——误读时有发生，谎言和真相一样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以中世纪一封假的罗马帝国皇帝的信为例，阐明了虚假的事物对于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影响。（3）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知识分子不解决现在的问题，只能解决未来的问题。”（张鹭，2007，p. 111）艾柯认为，指望知识分子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现实的。除此之外，他对环境污染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的担忧。（4）对误读的看法：误读时有发生，但并非所有阅读都是误读。关于误读的看法，笔者在前文已经做了充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艾柯既谈文学也谈战争，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与其作品译者的沟通问题，艾柯认为，译者最好是能和他多进行沟通交流，日本的译者到意大利与他进行沟通，向他讨教问询，这让他“非常高兴”（夏榆，2007，p. 1）。所以，艾柯也希望中国的译者能与他多一些沟通。（2）关于作家关注的重心问题：无论是卡尔维诺那样关心政治、战争等现世题材的作家，还是马尔克斯那样注重文学形式或者文体试验的作家，都具有现实意义。他以自己的小说《玫瑰的名字》为例，有些人认为这是本历史小说，因为它以中世纪为背景，题材来源于中世纪。“但是我借用一个历史题材反映意大利现实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作为欧洲现代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艾柯显然是关注着这个世界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现在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地球的存亡问题，我岁数已经很大了，但我还有个6岁的孙子，所以我很关心这个星球未来是什么样子。”（张鹭，2007，p. 111）这句话也与前文提到的——知识分子无法完全关注现在并对现

实起作用，他们关注和影响的是未来——不谋而合。

对于大家关注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否发生变化这个问题，艾柯指出这不是关键。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会走上街头示威，在社会正义走失后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艾柯对于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仍感到悲观。这并不是说明知识分子丢掉了对于社会事业的狂热，而是人们一开始的预设就选错了对象。艾柯认为，知识分子的狂热不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来表现的，正确的预设应该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民对公共事业表达关心，不应该时时刻刻被扣上“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要把知识分子的行动和公民的行动混在一起”（乐黛云，1995，p.2），很好地表达了艾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文学已死”这个观点，艾柯显然并不认同。艾柯说：“一会儿说文学死了，一会儿说小说死了，更疯狂的说法是书已经死了，但事实上，我还在不断地阅读、在写作。”他毫不留情地抨击“那样的说法非常愚蠢”（夏榆，2007，p.1）。艾柯对于中国的感受很复杂。他到过中国很多城市，复杂的行程很难用简单的话语概括。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到了北京就像到了洛杉矶”。

总的来讲，艾柯的两次中国之行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晶，两次中国之行也有各自的重心，体现了艾柯认识的变化，也从侧面展示了中国与世界接轨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第一次中国行的主题就是“文化”，艾柯认为独角兽与龙的交流应该是平等的，不能以独角兽的角度对龙做出判断，反之也不可以。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病，和中国文化相互问询、讨教，这才是对世界文化应该抱持的态度。第二次中国之行与上一次相隔14年之久。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人们关注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艾柯主要就战争、互联网等热门话题展开了论述，当然也有文学。总的来说，“误读”这个诠释学的概念贯穿了艾柯中国之行的整个过程，他关注的历史的、政治的、人文的问题都涉及“误读”。对中国城市建设的误读、对战争态度的误读、对文学和书籍的误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尽管艾柯博览群书，他对诠释、对人类探索世界，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认为谁也不能真正清楚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没有人能看清这个世界。这其实正是艾柯的智慧所在，不管是出于谦虚，还是受神秘主义或者不可知论的影响，我们应当知晓，不管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有待发掘的东西还有很多，这也是文学不死、文化不死、书籍不死的原因。

二、艾柯对中国的研究和兴趣

艾柯在许多文章里都提到中国，他对中国始终怀有好感和好奇心。他曾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过中国的漫画，撰文《人民的漫画书：红色娘子军，围剿及其他中国漫画》（“The People’s Comic Book: Red Women’s Detachment, Hot on the Trail, and Other Chinese Comics”），在《推延的启示》（1994）中有一篇文章《论中国连环漫画：反信息和交替信息》（“On Chinese Comic Strips: Counter-information and Alternative-information”）。在《康德与鸭嘴兽》（1999）中有一篇文章《马可·波罗与独角兽》（“Marco Polo and the Unicorn”），谈到马可·波罗当年在东方和中国游历的趣事。在《寻找完美语言》（1995）中有专文比较埃及和中国的语言意象（“The Egyptian vs. the Chinese Way”）。艾柯在多篇论文里谈到汉字，也有学者认为汉字是上帝赐给亚当的语言，即完美语言。

在《开放的作品》（2005）中的文章《禅与西方》写于1959年，当时在意大利对禅的兴趣开始流行起来，这也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和日本的禅大感兴趣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家发行量很大的美国杂志归纳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时写道：“最近几年，一个日本词，一个发声嗡而尖的词，人们经常会在很多地方听到，或是明确有所指的，在同女士们交谈时，在学术性的会议上，在鸡尾酒会上，到处都能听到。这个小小的引人振奋的词就是‘Zen’（禅）。”（艾柯，2006，p.172）艾柯认为禅已经超越了“习俗现象”，因为它是对佛学的一种阐述，而佛学的历史已经有很多个世纪，对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具有深刻影响。但是，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禅成为一种习俗现象还是近几年的事：“禅和垮掉的一代、禅和心理分析、禅和美国的先锋音乐、禅和非形象绘画，最后是禅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禅和海德格尔、禅和荣格等等。”（艾柯，2006，p.172）许多非常有名的人物在研究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出现大量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艾柯问道：“是什么原因使禅在西方大行其道？”他从禅的主张、众多的案例来分析禅在西方流行的原因，从文学领域如垮掉的一代到哲学领域如现象学，从中国到日本，艾柯的研究分析深入而具体，他认为禅最终不能成为西方人的主流，它只是西方人的认知模式的一种补充。

艾柯对中国的研究还体现在他对其他汉学研究者的关注，比如他对基歇尔的《图说中国》和其他意大利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评说都有自己的独特看

法。艾柯深入研究过基歇尔，认为他对中国的看法很多是想象的，比如基歇尔认为中国人是埃及后裔甚至是希伯来闪族后裔，中国的文字也源于埃及文字。艾柯对于海外汉学也有研究，相关观点集中在第一次到中国时发表的论文《他们寻找独角兽》中，主要论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他提到许多对中国文化入迷的人，比如著名的哲学家培根和莱布尼茨，他们对汉字都有研究，有的喜欢，有的讨厌，然而，无论如何西方学者都是在东方文化中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艾柯认为这就是中西方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西方学者在中国文化中应该寻找的是龙而不是独角兽。艾柯的研究资料详尽、内容可信，从他对中国的研究看得出他对中国有深切的关注。

在文集《在超现实中旅行》中，艾柯有一篇文章《论阐释；或者，成为马可波罗的难度》，讨论中国如何接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1974年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在威尼斯双年展上遭禁的那晚，艾柯正好在首映现场，所以他非常清楚来龙去脉。1977年，艾柯在《电影季刊》发表文章，以符号学家和文化评论家的身份，结合对电影语言表达手法的分析，既道出了安东尼奥尼身为西方导演来拍摄中国的左右为难的苦衷，也解释了艺术作品处于世界上两种不同文化之中，自然会受到人类学和符号学的价值判断，也难免被另一文化误读、曲解甚至拒绝。他给予双方的都是理解。

艾柯第二次到中国，曾经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武平先生有过频繁交流，赵武平撰文回忆：

翁贝托也还说过，自从马可波罗访问中国以来，无数向往中国，热爱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即所谓的“中国爱好者”（Sinophiles），无论是虔信的耶稣会传教士，还是“最后一个文艺复兴人物”基歇尔，和近代大哲学家莱布尼茨，或者其他后继者，都希望接近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进行交流。但他们努力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在新时代做马可·波罗，同样面临风险和困难。

（赵武平，2016）

但是赵武平表示：“翁贝托也是一位真诚的‘中国爱好者’，一个想真正了解当代中国的马可·波罗。”

艾柯在他的《别想摆脱书》的结尾，谈到他的藏书之命运问题时说：“也许我的藏书会让中国人买走吧？我曾收到某一期在美国出版的《符号学》杂志，那一期是中国符号学专题。杂志中对我的作品的引用次数甚至超过了我们的专著。也许，有那么一天，比起别的地方的人，我的藏书将引起有志

□ 符号与传媒（24）

了解西方荒唐种种的中国研究者的特别兴趣吧。”（吴雅凌，2010，p. 286）可以将这段话看作艾柯对中国的一种友好表示和对中国学术的期望。

三、艾柯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与艾柯的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比较落后，不过对于艾柯作品的翻译已经小有规模，研究性的学术论文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20世纪80年代艾柯及其研究被引进中国，国内最早介绍艾柯的文字材料是1981年王祖望翻译的载于《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的美国人T. 谢拜奥克的《符号学的起源与发展》一文，文中提到了艾柯在国际符号学界所起的作用，并且以注释的方式对艾柯做了简要说明。1984年，艾柯的小说《玫瑰之名》首次得到介绍。1984年《译林》第2期上弋边的《世界文坛动态》介绍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提及该书在美国受欢迎的情形，此外，作者认为这部小说基于虚无主义，人为杜撰情节的痕迹比较明显。

1986年《外国文学》第6期载王斑的《高雅的传奇故事》，在国内第一次详细介绍艾柯《玫瑰之名》的故事内容，并在文中预告读者，《玫瑰之名》已由北京外语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外国文学》杂志的五位青年译者翻译，不久将在《外国文学》上以连载的方式与读者见面。接着，1987年《外国文学》第4期至第10期连载了闵炳君翻译的《玫瑰的名字》，这个译本最终成书于198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译本对原本的内容和情节做了适量删减，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卷首附艾柯的亲笔信，他对自己的作品被翻译到中国表示高兴。1988年，林泰、仲林和曙光翻译的《玫瑰之名》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版本根据英文版《玫瑰之名》翻译而来，文笔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1987年，中国符号学家李幼蒸编译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对艾柯的符号学理论进行了介绍，这是国内比较早的对艾柯的理论介绍。总之，20世纪80年代引进艾柯之初，主要的成果就是出版了两个版本的《玫瑰之名》。

进入90年代，国内对艾柯的理论有了比较深入的译介。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卢德平翻译的《符号学理论》，该书是艾柯的符号学重要著作，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备受推崇。1993年，艾柯第一次来中国，并在北大发表了题为《独角兽与龙》的演说。1995年，曾有一本林周戚译的《玫瑰之乱》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玫瑰之名》中译本的第三个版本。1997年，王宇根译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在国内曾

引起过较大的反响。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李幼蒸的著作《理论符号学导论》，对艾柯的符号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此外，还有一些介绍性文章。总之，20世纪90年代对艾柯的最重要的译介就是他的《符号学理论》《诠释与过度诠释》这两本理论著作。

2000年以来，对艾柯的译介呈现繁荣之势，尤其是他的小说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翻译。2001年，谢瑶玲译的《玫瑰的名字》、翁德明译的《昨日之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明岳、俞宜国翻译的日本筱原资明的《埃柯：符号的时空》，这本书对艾柯的研究比较全面，按时间顺序论述艾柯的理论和创作，对于国内的艾柯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谢瑶玲译的《傅科摆》，华龄出版社出版了高俊方译的《大学生如何写毕业论文》。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殳俏、马淑艳共同翻译的《带着鲑鱼去旅行》。由康慨翻译的艾柯的《书的未来》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该文根据艾柯在2003年11月1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长篇演讲《书的未来》翻译而来，原文刊于开罗《金字塔周刊》(Al-Ahram Weekly)。2005年，新星出版社出版刘儒庭翻译的艾柯成名作《开放的作品》，三联书店出版俞冰夏翻译的《悠游小说林》，王宇根所译《诠释与过度诠释》再版。200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天清翻译的艾柯学术专著《符号学与语言哲学》，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吴燕莛翻译的艾柯随笔小品集《误读》。

2007年3月，艾柯第二次到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治与乱”研讨会上发表了《古典战争与后现代战争》演讲。艾柯此次中国之行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并受到《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国内主流媒体的跟踪报道。同年，杨孟哲翻译的《波多里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彭淮栋翻译的《美的历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此外，艾柯的访谈录也频频出现：2000年第6期《花城》载晓强译的《艾柯访谈录》，该文选译自俄国1998年6月2日的《书评报》，访谈者为亚历山大·休普洛夫和尼古拉·奥格洛布林；2002年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载张仰钊译的法国皮埃尔·邦瑟恩、阿兰·让伯尔辑录的《恩贝托·埃科访谈录》，该文系法国《读书》杂志所刊登的对艾柯的采访内容，涉及他的个人创作以及他所关心的问题；2007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和报纸上出现了大量的艾柯访谈录，这些访谈录对于研究艾柯也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以上是艾柯的译介简况，迄今为止，国内对艾柯的翻译已经小有规模，其中香港、台湾对艾柯的翻译超过了大陆，艾柯的符号学、诠释学、文艺理

□ 符号与传媒（24）

论，更多的是小说，都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翻译。虽然如此，他的很多意大利语和英语作品依然没有翻译成中文，这是遗憾，也希望今后中国学者能够翻译艾柯的更多作品，将一个完整的艾柯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但是目前已有的翻译作品不少是从英语转译而来的（当然艾柯部分作品是用英语写成的），译文的质量各有参差，其中不乏谬误。与艾柯在多个领域的丰富的原著比较，翻译还是有点少。令人欣慰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工作者重译艾柯的作品，自2007年迄今已经翻译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艾柯作品，这对于中国的艾柯研究无疑会有很大的促进和帮助。

与较为繁荣的翻译现状相比，对艾柯进行学术研究的队伍的实力和规模都显得相对薄弱，长期停留于对艾柯及其作品的介绍上，缺乏深入的研究成果。随着翻译和介绍的日益增多，对艾柯的研究也逐步加深了，但总体上还不能和西方相比。

国内的艾柯研究尚处于初期，深入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目前艾柯研究专著有五部：于晓峰《诠释的张力：埃科文本阐释理论研究》（2010），孙慧《艾柯文艺思想研究》（2015），李静《符号的世界——艾柯小说研究》（2017）和《符号学家的文学世界——艾柯文学研究》（2018），朱桃香《联结碎片：解读艾柯的迷宫文本理论》（2019）。硕博士论文现有十余篇，集中在艾柯的符号学、阐释学理论和小说方面。对艾柯的美学研究比较少，中国知网上的论文只有很少几篇，例如《美的理想与美的存在——读〈美的历史〉》《美的西方发展轨迹——评翁贝托·艾柯的〈美的历史〉》《试论艾柯的美学及其小说实践》，前两篇简单评述艾柯的美学思想，后一篇主要分析艾柯美学与小说的关系。其他刊物或网站上有零碎的短评。关于艾柯的美学研究，既无硕博士论文，更无专著，这样的研究现状相对艾柯这样的美学大师而言显然不相称。艾柯对世界的影响深刻且广泛，选择艾柯进行研究，具有积极的科学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所以，进一步推动艾柯研究的深入，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之所在。

结 语

在西方，艾柯是一位全方位的学者，被称为博学大师和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对于世界上各种符号或者文化现象的敏锐感知让他在这些领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文艺创作领域，艾柯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集大成学者型作家。此外，艾柯还是一位著名的公

共知识分子，写过大量的政论杂文。与一般的文人作家不同，艾柯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格局、政治经济也有很深入的了解，对于人类现在所处的世界做了许多的思考，对于欧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提出过种种假设。可以看到，不管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艾柯都有涉猎且见解独到。即便如此，艾柯具有大多数西方学者不具备的全面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对于中国，除了如一些汉学家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少量学者外，艾柯是少有的愿意全面了解中国，以公正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文艺和社会的西方学者。一方面，艾柯主动了解中国文化，主动关注近代工业文明以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位置，关注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注重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中国文化元素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比如在《开放的作品》中，他用大量篇幅谈到禅在西方引起的关注。

近年来，艾柯在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他的作品一度畅销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的“文化迷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去探索。艾柯的各种创见洞见，关于人类文化，关于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能给当今学人带来极大的鼓舞和启发。我们应该从艾柯身上看到人类掌握知识、把握世界的可能性，应该有像艾柯一样追求知识、探讨宇宙的精神，从而推动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附：艾柯去世

艾柯于2016年2月19日去世，国际符号学会开了专门的网页供世人纪念。世界各大媒体都有报道这颗巨星去世的消息，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学者写文章进行悼念，很多媒体也进行了专门的报道，四川大学符号学研究所网站和杂志做了纪念专栏、专刊。

引用文献：

- 艾柯，翁贝托（2005）. 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
 - 托纳克，让·菲利浦·德（2010）. 别想摆脱书——艾柯 & 卡里埃尔对话录.（让·菲利浦·德·托纳克，编；吴雅凌，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夏榆（2007）. 我是一个经常被误读的人. 南方周末，D25，1.
 - 乐黛云，勒·比松（1995）. 独角兽与龙.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鹭（2007）. 艾柯：我没说过“一切阅读都是误读”. 新世纪周刊，50，110－111.
 - 赵武平（2016-02-29）. 翁贝托，你一定是带着微笑走的——纪念一位远去的可敬智者.
- 获取自 <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view/index/news/5006>.

符号与传媒（24）

作者简介：

李静，文学博士，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重庆大学语言认知及语言应用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符号学、美学哲学。

Author:

Li Jing,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full-time researcher at the Research Base of Language Cognition and Language Application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emiotics, aesthetic philosophy.

Email: oceans1997@sina.com